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 国 近 代
思 想 家 文 库



赵晓阳 编

赵紫宸卷

 中国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 国 近 代
思 想 家 文 库



赵晓阳 编

赵紫宸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赵紫宸卷/赵晓阳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300-20457-4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赵紫宸 (1888~1979)-思想评论 IV. ①B25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2347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赵紫宸卷

赵晓阳 编

Zhao Ziche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010 - 62511770 (质管部)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27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33 000	定 价	6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 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言

赵紫宸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基督教教育家、诗人、作家、书法家。他是中国 20 世纪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神学家之一，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国际地位最高之人，是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神学的奠基人。他的基督教思想广泛地影响了华人教会的神学传统，无论是赞同他或是反对他的人，都不可能无视他在中国基督教神学界的地位和贡献。

赵紫宸，英文名 T. C. Chao，或 Chao Tzu-ch'en，于 1888 年 2 月 14 日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的一个非基督教家庭。原本家中殷实，因太平军起，致家道中落。他在家乡受过传统私塾教育，熟读四书五经。

15 岁时，赵紫宸赴苏州入教会中学——桃坞中学读书，这时他开始正式接触基督教。19 岁，他进入苏州的东吴大学学习，东吴大学属美国基督教南监理会办的学校。22 岁，他从东吴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BA)，受聘东吴大学附中任教，教授英文、算术、圣经等课程。19 岁时，赵紫宸在苏州受洗，成为基督教监理会信徒，回家后被父母斥责打骂。但经过他不断努力和传道，他的母亲、父亲、妻子皆受洗入教，成为了基督徒。

1914 年夏，26 岁的赵紫宸作为中国基督教监理会的代表，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参加美国南方基督教监理会总会议。秋天，进入美国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 (Vanderbilt University) 神学院，研读神学、

社会学和哲学。1917 年获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学士学位 (BD)，论文题为 “The Problem of Evil”，并因成绩优异获校方颁发创校者奖牌。同年回国，就任东吴大学哲学系教授。

1919 年，他与在北京的李荣芳、吴耀宗、刘廷芳、丁淑静、李天禄、徐宝谦、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等十几位中外基督教徒学者，共同在北京创立以提倡基督教新思潮为目的的“证道团”(1924 年春更名为“生命社”)，希望突破传统的宗派界限和各教派之间的门户藩篱，寻求中国基督教会的合一，出版杂志《生命月刊》。1922 年，34 岁的他出任东吴大学校务长。1927 年，东吴大学成立 25 周年纪念时，授予赵紫宸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26 年，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邀，赴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任宗教哲学教授，并兼任中文系教授，讲授陶渊明、杜甫等人的古典诗词。1928 年，出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1941 年 7 月，他由昆明抵香港，由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主教 (Bishop R. O. Hall) 按立，成为圣公会信徒，后何明华连续两次按立他为中华圣公会会吏、会长 (牧师)。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爆发，8 日，与燕京大学师生陆志韦、洪焜莲等 20 余人同时被日寇逮捕入狱，燕京大学被迫关闭。1942 年 6 月 1 日获释，系狱 193 天。1945 年 8 月，燕京大学复校，继续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

1951 年，中国基督教会的控诉运动开始。1952 年 3 月初，他两次呈交自我批判的坦白书，都没有被控诉委员会接受。随之圣公会褫夺他在圣公会华北教区的职务，撤销了他担任长达 24 年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职务。1953 年 4 月，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和北京神学院、联合女子圣道学院合并组成燕京协和神学院，他被聘为研究教授，不再授课，此后便赋闲在家。

作为中国基督教会学贯中西的杰出学者和教育家，赵紫宸先生还积极参加世界基督教会的各种活动，为扩大中国基督教会的影响和奠定地位作出自己的努力，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1910 年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大会是现代基督教历史上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式会议，出席会议的 1200 人中，中国基督徒代表仅有屈指可数的 3 人，他就是其中之一。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成立于 1921 年，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大陆基督教不再参加国际基督教活动之前，共举行过 3 次大会，即 1928 年的耶路撒冷大会、1938 年的印度马德拉斯大会、1947

年的加拿大维特比(Whitby)大会，他参加了其中的两次。

1928年3月，他代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参加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宣教大会，来自中国的代表已经增至20人。1932年，他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并教授中国诗歌，受到热烈欢迎。1933年2月，出席在英国爱丁堡召开的基督教会议，并发表演说。1938年，他赴印度马德拉斯参加大会，还特别报告了编写《民众诗歌》为乡村基督徒所喜爱一事。1947年7月，代表燕京大学出席普林斯顿大学成立200周年纪念活动，并被授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被称为“向东方心灵诠释基督教信仰的首席学者，鼓舞人心的老师，卓越的诗人”。1948年8月，60岁的赵紫宸参加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成立大会，当选为六位主席之一，是六位主席中唯一的东方人、中国人，这是截至今天中国人在国际基督教历史上取得的最高荣誉。这是中国基督教在国际舞台的活动达到巅峰，也是当时亚非拉基督教会领袖在国际基督教舞台上由史以来担任的令人瞩目的最高职务，赵紫宸先生在国际基督教界受人尊重和敬仰由此可见一斑。1951年4月28日，为抗议美国介入朝鲜战争，他辞去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主席的职务。

赵紫宸先生还积极参与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1949年9月，他作为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参与制定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1950年7月28日，经过八次修改，赵紫宸、吴耀宗等40位基督领袖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通称《三自宣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正式开展起来。中国基督教会抗美援朝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委会成立，他当选为筹委会25位成员之一。1954年7月22日，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选出139位委员，赵紫宸先生为42位常务委员之一。从1955年直至去世，他任第一至第五届北京市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备受磨难。1979年11月21日，赵紫宸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91岁。

—

赵紫宸先生是作为基督教神学家和教育家为世人所知的，他一直都高度重视基督教文化事业，成果令世人瞩目。在民国年间著名的中英文

基督教刊物上都能看到他积极努力的成果，这一切成为今天研究赵紫宸的文献基础，也成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神学的文献基础。他终生笔耕不辍，主题涉及中国基督教会建设、基督教的中国本土化、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基督教与政治、普世教会的发展、基督教神学教育、教会论、基督论、上帝论、人生追求与个人灵修等，遍及几乎中国基督教史上的所有主题。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实际问题的中国基督教神学作品，这些包含着强烈神学视野和社会关怀的作品已成为中国基督教经典，给中国基督教会和社会留下了丰富宝贵的遗产。

赵紫宸著述从语言角度可分为中文、英文两大类。中文著述近 300 万字，英文约 60 万字，还有大量的赞美诗歌、旧体诗和新诗。英文文章主要发表在以下刊物：*The Chinese Recorder*, *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Christianity and Crisis*, *Student World*,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Educational Revie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中文文章题材有神学专著、学术论文、讲词、回忆录、评论、诗词，绝大部分都发表在基督教会主办的刊物上，如《生命月刊》、《真理与生命》、《天风》、《消息》、《青年进步》、《东吴月报》、《兴华》、《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文社月刊》、《紫晶》、《燕京宗教时论》、《恩友》、《希望月刊》、《燕京学报》、《基督教丛刊》、《协进月刊》等。此外，他还出版了大量探讨基督教神学的专著，即《基督与我的人格》（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25 年）、《基督教哲学》（上海：中华基督教文社，1926 年）、《耶稣的人生哲学》（上海：中华基督教文社，1926 年）、《万方朝圣录》（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8 年）、《祈向》（祷文集）（上海：广学会，1931 年）、《耶稣传》（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5 年第 1 版，1939 年第 3 版，1948 年第 5 版，1965 年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再版，1986 年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又版，1988 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学仁》（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1936 年）、《巴德的宗教思想》（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8 年）、《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上海：广学会，1946 年第 1 版；成都：华英书局，1947 年第 2 版）、《基督教进解》（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7 年第 1 版，1950 年第 3 版；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5 年再版）、《圣保罗传》（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7 年第 1 版，1948 年再版；中国基督教协会，1999 年再版）、《基督徒职业的召命》（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8 年）、

《基督教教会的意义》（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8 年）、《神学四讲》（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8 年；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5 年）、《基督教的伦理》（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8 年）、《系狱记》（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8 年第 1 版，1950 年再版；1969 年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再版）。

赵紫宸先生对中国古典诗词、戏曲以及书法都有很深的造诣。他还是著名的诗人，终生都对诗词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创作的热情，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新诗和赞美诗。他从 1922 年开始创作白话新诗，1930 年广学会出版了他的新诗集《打鱼》，1938 年自费刊印了他的旧体诗词《玻璃声》（其中含 21 首白话诗）。1931 年，燕大基督教团契出版了由他作词、燕京大学音乐教授范天祥（Bliss Wiant）谱曲的《团契圣歌集》（燕大基督教团契，1933 年 2 月再版）；同年，广学会出版了他们合作的《民众圣歌集》（1934 年由燕京印刷所再版），成为基督教赞美诗的经典。

《团契圣歌集》收录圣诗 124 首，均为历代教会名歌，绝大部分为赵紫宸所译，1933 年再版时增至 155 首。据赵紫宸先生介绍，该集试验了四种翻译方法，一是用古诗体，二是用绝句法，三是用白话文言合参，四是纯粹白话。其译词之流利、用字之审慎、押韵之自然，向为评者称道。《民众圣歌集》收诗歌 54 首，全由赵先生一人创作。该集所收的曲调，皆系中国流行的民间曲调，配合四声，这在当时的中国实属创举。为普通信众，尤其农村的民众创作，文字浅显易懂，颇受各地乡村同道的欢迎。他还创作了一些赞美诗收入到中国最大的赞美诗集《普天颂赞》中。所有这些赞美诗歌至今仍然传唱。

1944 年 7 月，赵紫宸先生还用中国古典诗词风格创作大型神乐清唱剧《圣诞曲》，由张肖虎作曲，并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六区青年会服务部礼堂公演。

三

赵紫宸先生不是一位著名的传道人，因此他在广大信徒中并不是“知名人士”，但他的著作是研究中国基督教和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必读书目。他深受西方基督教自由神学的熏陶，终生努力尝试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神学精华进行融合，开创了一些相关神学的思考。他的一生适逢

多事之年，他一直忧国忧民，致力于为中国教会谋出路，其心路和思考与时代脉搏紧扣，充满了困惑、挣扎和突破。

1935年，赵紫宸先生在短短的22天内写成了《耶稣传》，这是由中国人撰写的第一本《耶稣传》，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该书在十余年之内即再版四次，已经成为了基督教的经典。它是一部独特的宗教文学作品，结合了赵紫宸先生多年来的思想成果，按照中国人的眼光，用历史叙述的方法，加上丰富的想象及华丽的辞藻，为耶稣的一生编织了一幅极生动感人的图画。他认为自己是耶稣的弟子，一生对耶稣崇拜景仰，自己是本着“寻求真实的科学态度”及“寻求了解的想象与同情”，将自己对耶稣的认识和爱写出来。他还极力强调耶稣对中国前途具有的适应性和指导性，在他看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国难和救亡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本着耶稣的精神，学习和效法耶稣的人格，愿意为国为民牺牲。昔日耶稣是如何设法挽救犹太民族，而今日我们当效法它去救中国。他还以科学的眼光否定福音书中超自然的事迹，废弃了耶稣信徒末世论的观念，认为福音书的作者大都受犹太教信徒的末世论所渲染，将耶稣存放在他所放弃的末世论中间。这些都体现了他深受基督教自由派神学和圣经批判学的影响。

1925年11月，赵紫宸在病榻上完成专著《基督教哲学》，此为中国人自撰的第一本基督教哲学著述。该书采用了对话体形式，当时正处于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由于赵紫宸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科学与理性主义思潮盛行，他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专门探讨科学主义及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从上帝观、恶、耶稣、救法等多层面诠释基督教信仰，强调信仰宗教的理性在于基督教中所体现出的耶稣的伟大人格，并以人格论阐释上帝的本性，指出神人关系中的互相，是人性得以完全、人生得以圆满的原动力。

1922年的全国基督教大会正式为中国基督教本色教会运动拉开了序幕。他作为大会宣言的三人撰写小组之一，对本色教会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一是脱离宗派主义而统一，二是以自养、自治、自传为目标，三是保持中西教会的关系，四是适合中华民族的文化经验。这个本色教会是属于中国的，“其国民性并不因为它是植根在中国的泥土里，也不因为它的成员全部都是中国人，但是因为它对国家有一个特别的信息和特别的使命，这使命是把中国人的文明属灵化”。

教会本色化的概念早先存在于一些外国传教士的思想和理念中，他

们相信中国教会将来必须走上自养、自治、自传的道路。中国基督徒中也早已有人开始本土教会的实践活动。在赵紫宸看来，中国本色教会将会是一个独立、自主、超越宗派、脱离公会的信仰群体。这个群体放弃了西方传统的繁文缛节，特别保留了中国文化内在的各种真理和理念，并使其与基督教互相结合，用适合国情的形式和方法，发挥这种宗教的生命力，让这个教会属于中国。

赵紫宸先生信奉基督教，同时也热爱中国文化，他的本色神学游走在这两者之间。创造中华基督教就是基督教中国化，就是“把基督教和中国古文化所孕涵的一切真理化合为一，使中国基督徒底宗教生活和经验合乎国土国风，不至于发生不自然的反应”（《本色教会的商榷》）。他极力肯定中国文化内含优良的成分，而基督教信仰能与这悠久的文化传统结合，创造出本色化的基督教神学。在他来看，本色神学必须有两方面的肯定和忠诚：他信奉基督教，同时也热爱中国文化。他相信上帝在中国历史上，不能否定有上帝的作为；在以前诸子百家的圣训中，必定含有一些上帝启示的真理，这些“文化的优点”可与基督教“并为一体，而成为中国的基督教”《中国人的教会意识》。

这也是基督教对中国传统文化能提供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所显示的宗教经验。基督教是可以救中国的。他坚信，基督教并不是要废弃中国文化，乃是要改造它、完善它、成全它。借着上帝父的观念，基督教可以推广孝道，并巩固中国伦理化的基础。他认为，基督教对儒家最大的贡献，是在耶稣基督里所显示的宗教经验。与上帝联结的关系，能充实并成全儒家。

针对中国传统伦理化的宗教，他认为基督教信仰可以帮助中国人的品德修养，达成儒家所讲君子的标准。在中国人非常务实的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可以为中国文化提供一个精神的基础，在宗教经验上指明了清晰的方向，即寻求与上帝的契合，使人生实现它的价值，活出生命真正的意义。

赵先生还是著名的基督教教育家，在他的领导和经营努力下，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成为中国培养高级神学和高层教牧人员的超一流高等学府。新中国成立前，全国的神学院共有几十个，而以大学毕业生为招生对象，培养研究生的神学院只有金陵神学院和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金陵神学院的掌门人多是外国人，以美国人为主，而燕京宗教学院的院长是中国人，这在中国基督教教育史上别具意义。在他担任院长期间，他以

鲜明的神学立场为宗教学院创立了优良的传统：促进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努力与现实社会相适应，促进中国教会中各个宗派的合一与团结。

四

1950 年前，赵紫宸先生的著述或单本出版，或将一段时间的论述以某个主题结集出版，大部分都再版多版，成为一时之名品、精品，这也使他成为中国基督教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尤其他的《基督教哲学》，与吴耀宗的《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堪称那个时代最能代表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三本书。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著述除发表在那一时期的杂志刊物外，1949 年后再没有结集公开正式出版过。直至 21 世纪后，燕京研究院得到美国鲁斯基金会的资助，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赵紫宸文集》。本次入选“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使其第一次以“近代思想家”的面貌重新被世人所认知和理解。事实上，他一直以来更多的是以一位“基督教思想家”而非教会人物的定位，来直面他所生活的时代。

本书以赵紫宸先生影响最大、最有思想代表性、最讨论基督教本色神学的文章组成。考虑本书面向整个社会出版，读者可能不熟悉《圣经》，原文中的《马可》《哥前》分别修改为《马可福音》《哥林多前书》。